



中山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博士文库

道德建设的文化 机制研究

魏则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道德建设的文化 机制研究

魏则胜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建设的文化机制研究/魏则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

(中山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博士文库)

ISBN 7-218-04884-6

I. 道… II. 魏… III. 社会-道德-研究-中国
IV. B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7060 号

责任编辑	郑毅 卢雪华
封面设计	张力平 阙文晖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金冠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884-6/B·153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80517 020-83794727)

总 序

《中山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博士文库》出版了，这是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理论成果，它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支队伍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长期的探索与不懈的追求。记得1998年底我刚调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时，曾到理论部（现为教育学院社科部）调研，我为中大有这样一支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教师队伍和他们富有成效的工作感到骄傲。转眼六年过去了，全国第一套《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博士文库》的出版，正是这支队伍、这个学科成长的见证。我深知其中的分量与意义！我再次为他们的努力与追求表达敬意和祝贺！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问题是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因为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与前途。中共中央16号文（中发〔2004〕16号）已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要旨。必须看到，伴随着上个世纪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社会转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单一社会形态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多元交错的今天却变成了不可避免、却又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

人们的思想、社会、时代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直面变化的难处就在于需要我们自己的思想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我们的认识，同时更需要毅力和不停的探求。思想道德教育与一般知识教育不同，它是人类价值认识的结果。而科学认识往往不依赖主体自身的特性，它的认识终极是客体性的，或者说是可被证明的；价值认识却是依赖主体自身特殊性的，其认识终极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换言之，其难度就在于这是无法在一个短时间内被普遍实证的，甚至是需要学生自己在今后人生经历中才能逐步体验、认同的。也正是如此，才凸显了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矛盾。

教育是永恒的事业，德育是这个事业的灵魂，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确实面对许多困难，这就需要培养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教育信仰的、负有社会责任感的、有专业水准和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从这个角度，这套文库的出版也意味着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成长与事业永续的希望！

李延保 教授

2005年5月

（作者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目 录

导 论	道德建设方式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建构	1
第一章	道德:人的发展尺度	21
第一节	我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	21
第二节	道德困境的原因分析	26
第二章	人的本质的文化内涵	40
第一节	文化现象分析	40
第二节	人的本质的二重性	59
第三节	人的本质发展的文化途径	72
第三章	道德发展的文化规定	79
第一节	物质文化:道德建设的客观基础	79
第二节	制度文化:道德建设的保障系统	89
第三节	精神文化:道德建设的理性源泉	102
第四节	文化模式的道德建构功能	115
第四章	道德建设文化方式的历史分析	121
第一节	中国道德发展历程的文化分析	122
第二节	西方道德发展历程的文化分析	142
第三节	中、西方道德的差异与差距	148



第五章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文化思考	151
第一节 道德建设的文化坐标	151
第二节 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	165
结束语	177
参考文献	178
后 记	181





导论

道德建设方式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建构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① 对自然和人自身两个宇宙的探索，代表人类智慧最深远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人类改进生存状态的梦想和渴望。然而，与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形成明显反差的是，道德进步之路迂回曲折，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赞美和崇拜，彰显道德理想的相对落寞。但人类从未拒绝将关注的目光，从“在我之上的星空”转向“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现代社会对传统道德的改造，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与重构，都标明人类的道德追求已经融入生存理想的精髓，未曾停息探索的步伐。本书的话语背景，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道德及其教育的呼唤，书中所探讨的问题，是道德建设的方式问题，即将道德建设的视野，从伦理、教育和政治的方式，推进到文化方式，力图在道德建设所遵循的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规律中，寻求我国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① [德] 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77 页。

一、道德建设的三种方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民族，这种民族道德自豪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始终保持对道德状况的高度关注和道德理想的不懈追求。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让人深思的现象：在人们赞叹经济增长的强劲和物质文明的繁荣时，对道德现状的失望和责难之声也是不绝于耳，人们指责道德失范，感叹道德水平滑坡。面对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判断的相对主义与自我中心，人们忧心忡忡，甚至于有极端观点认为：道德滑坡是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和道德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现象。无论对这个问题作何种回应，有一点确定无疑：道德状况的确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面临必须解除的困境。

如何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道德目标的设立，解决“建设什么”的问题，二是道德建设的途径，解决“怎么建设”的问题。在以往，道德建设重点关注的是关于道德现象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问题，对于道德建设的方法论，依然存在理论探索的空间。实际上道德建设的方法论与道德存在的认识论、道德目标的价值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缺乏道德建设方法和有效途径的道德论，只能驻足于道德理想的此岸，这些方法仿佛是道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在道德目标和道德现状之间，跨越鸿沟的桥梁是不可或缺的。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理论认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它构成道德建设问题的第一个基本点。如果没有明确的道德目标，道德建设有可能走向虚无；如果道德目标缺乏价值合理性，道德建设将由于不能经受历史必然性的检验，或者由于不能得到广泛认同而失败。但是，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途径支持，道

德建设将无法从理想走向现实，道德目标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道德目标的确立和道德目标的实现构成道德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论追问，就是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论证和尽可能完善的道德建设方式的寻求。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本书从文化角度探讨确立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依据和道德建设的文化方式。

（一）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

即伦理学视野中的道德建设，它是指社会组织或个人按照伦理学观点进行的道德建设方式。这种道德建设方式的特点在于：它重点关注的是道德本体论与价值论，道德目标的确立和现实化，主要是按照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观念进行的，伦理学为其提供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论证和道德建设途径的理论设计，但它没有给予道德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力量以足够的重视。在历史上，伦理方式的探求主要有两条脉络，一是规范伦理的建构脉络，二是德性伦理的建构脉络。“规范伦理”将道德定义为一种以“善”、“恶”为评判尺度的价值行为规范，或者将道德定义为以“正当”或“不正当”为基本判断标准的约束性规范，它从主体身外的社会关系、行为后果的善恶及正当与不正当之中寻求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整合规范体系，促进、保障规范的道德约束功能的正常运转，是“规范伦理”所设计的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它通常将道德与社会管理相联系，强调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和社会效用，轻视主体的道德自律与德性发展。“德性伦理”则将个人内在德性的养成和完善作为善恶、正当不正当的评判尺度。它从人的发展和德性完善中寻找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道德建设的方式偏重于道德知识的传授、道德行为的引导和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注重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发展。除此之外，中西方学者还从其他角度探讨道德建设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如西季威克认为，“伦理学方法”就是确证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的方法，在伦理思想史上，存在三种确证价



值合理性方法：利己主义、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西季威克的三种“伦理学方法”，樊浩先生则将其放在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从历史角度探讨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确证方法。他认为，伦理思想史上存在三种递进形态的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确证方法，即自我本位——关系本位——生态主义。利己主义、直觉主义、功利主义代表古典伦理学方法，从主体自身寻求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罗尔斯、麦金太尔等人的伦理思想代表关系本位，超越个人主义局限，在社会关系中寻找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依据，生态主义则代表当代伦理学方法的发展趋势。但是笔者认为，自我本位、关系本位及其延伸生态主义，与规范伦理的脉络相关；而麦金太尔重点关注的，是人的德性发展，因此与“德性伦理”相承接。纵观历史，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伦理学说，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伦理学说，中世纪宗教伦理学以及当代的麦金太尔提出的德性论，与德性伦理相联系。在中国以荀子为代表，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经英国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当代罗尔斯等人代表的学说皆与“规范伦理”相联系。“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作为伦理思想的划分标准，更具有包容性，也更能够体现关于“道德建设方式”问题的理论观点的差异。“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由于它们在道德目标价值合理性确立依据问题上观点的不同，导致各自的道德建设具体途径理论设计的差异，但在实质上都是道德的伦理建构方式。

（二）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

所谓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即在教育学的视野中思考道德问题，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教育的渠道传承人类的道德观念、道德知识和传统，按既定的道德标准培养新一代的道德品质。在我国，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教育方式与伦理方式紧密结合，可谓

“二位一体”，即古贤提倡的“德治”，包含了“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得以实现的保证。这种主张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之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其绝对性与稳定性受到封建制度的维护。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与政治方式紧密结合，构成了新的“二位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教育不仅与政治思想教育为同义语，而且道德建设的基本理念、目标与内容基本是以维护政治制度为前提和目的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正开启与深入，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受到了来自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全球化趋势等方面的挑战，促使人们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等角度对道德传承进行反思，其中不乏有许多积极有效的改革和完善之举。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从教育视野思考道德建设问题的。在西方，这种方式与人类的教育行为相伴生，但其规模的膨胀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道德教育的哲学理论，主要呈现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神学模式，指18世纪以前的德育模式，当时的学校德育主要是宗教教育。宗教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保障宗教道德观念的传承。第二阶段为权威模式。随着宗教在社会政治、经济与精神领域的退潮以及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拓展，学校德育发展到权威模式，时间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的教育学典型理论代表当推赫尔巴特，强调道德观念的灌输、严格的道德训练以及惩罚等，教师与学生处于绝对二分化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中。权威模式与宗教模式的道德教育对于道德目标的绝对性的强调是相同的，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20世纪初遭到巨大挑战。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西方道德教育观念开始从外在绝对性的寻求转向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发展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主化科学德育模式，其理论创始者首推约翰·杜威、让·皮亚杰，以及前苏联

的马卡连柯。其理论特点是：民主化，抛弃形而上机械论哲学基础和政治专制主义在德育方法上的延伸，代之以民主化的德育方式，强调教育对象的权利、自由和主体性；人性化，道德教育目的以人的发展或“经验增长”为中心，而不是外在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目的；科学化，将道德教育方法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之上，特别是当宗教道德与权威道德及其教育受到全面挑战的背景下，“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体谅德育模式”等应运而生。虽然这些学派或理论在传承道德的方式上有不同的着眼点和不同的理论依据，但其基本立场和目标是一致的，即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必须探讨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解决道德的传承问题。也许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模式不断更新的目的最清晰的表达，反映在价值澄清理论给自己设定的两个理论前提之中：当代儿童处于充满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中，这些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发展，他们无法获得一种稳定的价值生态；在当代社会中，根本没有一套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因此，学校只能培养学生的价值选择能力，而不是将某种现成的价值观当作知识传授给学生。价值澄清理论正是这种判断的探求结果，即这些理论模式不是放弃道德教育，而是在新的时代挑战面前，如何通过改变、改善传承的方式方法，达到更为有效的传承效果。

（三）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

与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教育方式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是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自“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式诞生后，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依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是指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建设或推行某种道德体系，其特点是从维护政治制度和追求一定政治理想的立场，选择、确定道德目标的价值合理性，使之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目标或

政治目标具有同一性。其道德建设途径，主要是依据制度体系将某种道德价值标准普遍化。这种方式注重道德理论的选择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某种道德体系，并维持其社会道德生活的主导地位。西汉时期，董仲舒就曾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利用政治手段推行儒家纲常教育。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既是人才选拔方式，也是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通过将人才选拔制度与儒家思想的结合，稳固地维持了儒家伦理观念的道德主导地位。15 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认为，道德的价值合理性衡量标准在于它的政治后果，国家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唯一行为准则。

二、道德建设的三种方式的相互关系

道德建设的三种方式在人类历史的变迁中既彼此相对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独立性表现在如下几点。第一，三种道德建设方式分别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伦理学、教育哲学和意识形态分别是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教育方式、政治方式的理论背景。三种理论的问题阈及其所关注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都彼此不同，对道德建设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所作出的理论回答也有较大差异。第二，三种道德建设方式的目标和实现途径不同。伦理方式偏重于个人道德目标，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认同，还是道德品质的修养，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主要以个人行为为载体；个人的道德价值认知和道德实践，是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的主要途径。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的目标在于向学生群体进行道德观念的传承和道德品质的培养、道德行为的引导，主要通过教育系统（包括教育制度和教育资源）进行道德建设。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式实际上是道德建设的政府行为，道德目标是政治目标的体现，通过政权体系和政治资源进行道德建设。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三种道德建设方式彼此独立。

道德建设三种方式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第一，道德



建设方式的三种理论体系，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彼此借用现象。伦理学是教育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关于道德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形态往往将合乎政治需要的道德理论确立为主流精神文化，通过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改造、借用，确立政治化道德建设观念并使之现实化。相对而言，教育哲学的道德建设观念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道德目标深受政治目标的影响，这是由于教育资源主要由政府调控的原因；伦理学则为教育哲学提供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理论框架。而教育哲学关于道德目标和道德建设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也推动了伦理学和意识形态在道德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变迁。三种道德建设理论从来就不是绝对分离的，只是在相对独立状态下各自有所侧重而已，它们共同构成道德文化的精神形式。第二，道德建设三种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具有相互倚重的关系，中西道德发展史上，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与政治方式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西方的宗教教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等，都体现了政治制度对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的深刻影响。20世纪虽然美国的约翰·杜威强烈反对政治对道德教育的干预，提出“教育无目的”命题，但他的道德建设观念依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思维框架。而且就当代中西方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来看，学生群体政治品质的培养或者政治社会化，是学校道德活动的主要内容。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也只有通过政治方式和教育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目的。因此，总体而言，道德建设的三种方式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人类道德实践方式的组成部分，将三种方式加以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建设方式中，由于政治方式强大的支配性，使教育方式、伦理方式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方式的调控性所遮蔽。因此，保持三种方式在相互联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利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

当我们对道德建设方式进行历史反思时，既要看到伦理方

式、教育方式和政治方式对推进道德建设的理论贡献，也要看到其各自存在的不足与缺失。

综观中西伦理方式的道德建设，可以看出它呈现三个特征：第一，在思想体系上，注重道德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寻求与确立，道德建设的方法论未曾占据伦理思想的核心位置。这与伦理学注重道德理论建构而忽视道德建设实践有关，或者说，在相对独立性向度，伦理学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使道德建设的伦理方式无法获得政治资源的支持。当伦理政治化或者伦理走向与政治合作后，道德建设的方法选择就由政治主宰，成为伦理思想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伦理学在道德建设途径问题上除了强调个体修炼以外，似乎没有留下更多操作层面的道德建设方法论。第二，在道德建构方式上，伦理学注重的是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一定的道德品质或实现一定的道德理想。虽然中西伦理思想经常在社会关系中讨论道德问题，但道德目标主要是个体的规范认同与德性修养，而不是从社会因素内在的本质联系中探讨道德建设途径。虽然有爱尔维修、卢梭等看到了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法律等文化因素对道德的影响，但伦理学方式所注重的道德建设途径始终是社会个体的道德发展，而没有将道德建设看作一个社会整体工程。第三，个体道德的发展并没有被置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系之中，抽象的道德发展代表了人的全面进步，忽略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历史性。无论是古希腊的德性论，还是中世纪的神性论，以及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启蒙运动，皆体现出这种特征。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遭到西方各种学派的批判，但他对道德与社会其他文化因素的内在联系的揭示，对人的发展条件的探索所达到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无法企及的。从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们便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道德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人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各种物质与精神条件，必须将道德发展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环节，



将人的发展看作社会总体进步的原因和结果，将道德建设看作社会总体工程，才有可能找到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道德建设方式。

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关注重点是如何通过教育传承道德，缺乏对道德必然性依据以深刻的考问；关注学校范围内的道德建设，尚未给予校园之外的社会个体以更多的道德关注。分析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及其理论体系，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第一，它所关注的重点是学校德育，即在校学生的道德发展，而且大部分理论家的兴趣所指在于儿童的道德培育，西方理论尤其如此。对道德建设方法的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真理性理论基础的研究，以及操作性设计都弥补了伦理学的天然不足，将道德建设方法从价值设定移向科学操作。在这个层面，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儿童群体之外，还有绝大部分的非儿童群体。更为明显的是，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没有给予社会绝大部分人群即学校之外的社会人的道德建设问题以同等关注。他们的道德发展该由谁负责？如何负责？这个问题被所有中西教育学理论都有意和无意地忽略了。学校德育所达到的社会部分群体的道德目标，无法完成社会道德工程宏伟的历史使命。它关注已在的价值观念的传承，以此作为道德建设的核心目标，在道德建设的价值论问题上，道德建设的教育方式的独立性弱于政治方式对它的支配性，它也由此经常面临道德建设目标价值合理性的怀疑和追问。

第二，学校德育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过过滤的社会亚环境中运行，但学生群体是以社会人的身份生活于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中。从现代社会信息流动的特点看，信息传播由于高效、迅捷、直观及其庞大的容量，对社会舆论、道德评判、价值变迁具有极大的影响。当学生走出校园步入充满力量冲突与精神迷惑的世界，他在学校道德建设工程中所获得的道德认知和信念，是否经得起反复的信息冲刷，实在令人疑惑。在德育过程中，存在一个极为显著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学校教育有组织化